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 (第7卷)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4 2008 (Vol 7)

从自然哲学到政治神学的嬗变
——试论阴阳五行在先秦的发展

张晓虎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 阴阳五行本是我国古老的自然崇拜观念, 在春秋时具有了哲学范畴的含义; 在战国末期的政治形势下, 阴阳五行由自然哲学转变为政治化的五德终始学说。政治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与流行民间的自然崇拜、数术方技结合起来, 它是以夸大、扭曲感性经验为特征的传统巫术思维方式为基础的。神学化的阴阳五行对中国秦汉以后两千年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使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侵染上巫术色彩。

关键词: 自然崇拜; 自然哲学; 巫术思维; 政治神学

中图分类号: B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08)04-0087-07

阴阳五行学说有漫长的发展历史, 它们在殷商和西周时发源于古人的方位崇拜和龟卜筮占, 春秋发展为朴素的自然哲学思想。战国中期五行与阴阳开始汇流成为政治神学化的五德终始学说。五德终始说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稳定政治的神权工具, 又与民间的方术巫技相接, 它贯通朝野, 给我国传统文化以深远的影响。

一、作为自然哲学的阴阳五行

阴阳与五行有漫长的发展历史, 它们在早期是相互独立的观念。到了战国时期才被有机地接合起来, 并延伸到哲学、政治、宗教领域。

"阴阳"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可能是用作占卜, 在陕西歧山发现的西周甲骨中就有"阳"并与风、雨等字并列出现。在金文中开始阴阳连用。《易经·中孚》有: "鸣鹤在阴, 其子合之。"庞朴先生认为: 阴阳源于楚人的枚占, 后被周人发挥, 但是在西周早期, 阴阳只是一种感性的现象[1]。在《诗经·大雅·公刘》中有: "相其阴阳, 观其流泉", 阴阳只有具体的感性观察含义。

到了西周末, "阴阳"超出筮占与具体自然现象演变为贯通天人的朴素自然哲学概念。《周语·国语上》记载: "幽王二年, 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 周将亡矣! 夫天地之气, 不失其序; 若过其序, 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 阴迫而不能蒸, 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 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 川源必塞; 源塞, 国必亡。"[2] 26

这里的阴阳不但是一种无形无象之气, 而且还扩展到无所不在, 能支配自然和社会现象。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然运动已经有了抽象范畴的性质。但这还是蕴涵在自然崇拜内容里的理论思想, 自然变化与国家兴亡被神秘地结合在一起。

收稿日期: 2008-08-06

作者简介: 张晓虎(1955—), 男, 陕西三原人,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道家从哲学角度发挥了阴阳学说。如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将阴阳发展成化生万物的原始动力,是一种辨证的哲学思维。范蠡提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2]653这种理性思维方式具有哲学范畴的那种普遍性质,同时还把阴阳运行与军事谋略学结合起来。

谈阴阳学说不能离开《周易》,《周易》的核心是阴阳学说。但原始的卦爻辞中并没有阴阳概念。将之系统发展的是战国时期出现的《易传》。《易传》高度发展了阴阳学说的哲理意义,如《系辞上》将筮占中的两两对立发展成阴阳之间的联系:“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说卦》把阴阳与天、地、人三才之道联系起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都是阴阳在哲学方面的发展。《易传》也承认鬼神世界的存在:“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筮。”(《易传·说卦》)

《易传》把占卜活动中人与神灵的种种神秘契合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理化思想。《易传·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70

《周易》来源于古代筮占,即通过蓍草变化来预测人事吉凶,是以原始的巫术思维为基础的。由于万物皆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昼夜、朝夕、明暗、刚柔、雌雄等等。用简单的“一”、“—”就可以象征、代表。随着历史的推移,大量的卜筮事例保存下来了。材料的积累使总结它们的意义时需要一个理论的框架,阴阳学说起到了这种理论框架的作用。但是占筮测命的巫术交感思维仍留下深深的烙印,如将男女交合类推为万物产生的原因,天地不交而万物不生[3]53。

从“交感”化生万物,这给万物变化注入了神秘的相互作用因素。将《周易》中的宗教巫术思想(象数)与哲学义理剥离开是王弼在三国时代才完成的。

五行思想也有悠久历史。

法国文化史学家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发现:处于原始信仰阶段的民族都有将数字与方位崇拜结合的习俗。北美印地安人把“4”这个数看成是神秘之数。在没有文字及数字符号的时候,印地安人用体态语来表达数字。“曼旦人那里,巫师表示‘5’是拿起烟斗,接着把烟斗伸向四方,最后伸向太阳。”[4]211

我国古代发生过类似情况,因为抽象概念不足,数字常被用来作为事物变化的神秘原因。“5”既与方位有关,又与一只手的指头数相等,有利于用体态语表达,所以经常被使用到,结果与一切事物都发生了联系。

从方位和数字崇拜发展到具有更多概括意义的“五行”在《尚书·洪范》中出现了:“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3]53

在《洪范》里,五行还是五种唯象的感性物质,并无后世相生相克,流动转化的含义。五行生克构成万物根源的意识在春秋时期形成。《左传》文公7年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是按相克顺序排列的。《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先哲凭借五行说提出了合而不同、多样性统一的辨证整体观。这是一种哲学的突破,如史伯对郑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2]515

但是朴素的自然哲学并不意味能达到无神论,如古希腊唯物大家赫拉克利特不否定神性,他提出的“逻各斯”后来成为上帝观念的滥觞。

在我国古代, 最先记载五行与神灵崇拜结合是《左传》昭公 29年记: “故有五行之官, 是谓五官, 实列受氏姓, 封为上公, 祀为贵神。社稷五祀, 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 火正曰祝融, 金正曰蓐收, 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6] 1503

同样的话也出现在《山海经》中: 东方句芒是“鸟身人面”;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国语·晋语二》描写虢公梦见西方金神蓐收的形象是: “有神人面白毛, 虎爪, 执钺立于西阿。”《墨子·明鬼下》描写东方木神句芒的形象是: “有神入门而左, 鸟身, 素服三绝, 面状正方。”[6] 249都是兽形未脱的原始神灵, 但已被五行方位化。五行在春秋晚期开始与神灵崇拜大量结合起来, 至战国则普遍出现。

五行不仅与神灵相配, 更经常作为一种巫术手段来应用。从宗教学来说, 巫术不同于神灵的人格神崇拜, 而是设想事物之间有一种超自然的物理力量, 通过神秘的修炼就可以掌握这种力量, 从而支配事物运行。阴阳五行化的巫术被称为“厌胜”。它认为万物间无不有阴阳五行的属性, 弥漫宇宙, 若调整其间关系就会引起生克胜负的直接效果, 所以要以人工方法强化阴阳五行在某一方面的气势。《墨子·旗帜》说: “守城之法, 木为苍旗, 火为赤旗, 薪樵为黄旗, 石为白旗, 水为黑旗。”[6] 277

当然, 对五色、五方、五数都有讲究。《墨子·迎敌祠》解说的则更为详细: 敌人从某一方向来, 就必须应之以某方向的坛位、旗色、动物; 守城者的人数、年龄、弓弩的数量都要与五的数字暗合。这里, 本来属于自然哲学的理论已经转变为一种荒唐的巫术迷信活动。

战国中期阴阳与五行合流, 出现了专门以阴阳五行为研究对象的阴阳家。他们多活动在齐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作品的汇编《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已》是阴阳家的早期著述。它已经将阴阳五行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 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四时教令体系。如《管子·五行》说: “故通乎阳气, 所以事天也, 经纬日月, 用之于民。通乎阴气, 所以事地也, 经纬星历, 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 然则神筮不灵, 神龟不卜黄帝泽参, 治之至也。”[6] 149

照五行理论, 要在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基础上, 按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秩序, 安排一年的政事和农业活动。阴阳家在战国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齐人邹衍, 他是以在燕齐一带的方士活动为背景的。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对秦以后的官方和民间宗教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开了秦汉政治神学的先河, 也极大地改变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说的面貌。

二、巫术理论政治神学化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提出了新的天命转移理论“五德终始”说, 把阴阳五行与政治兴衰完整地结合起来。他的著作在当时曾是非常丰富的,《汉书·艺文志》尚收有《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因为涉及过多政治敏感问题, 后世不传, 仅仅在《吕氏春秋》中有片断保留。《史记·封禅书》记载道: “自齐威、宣之时, 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 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帝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 为方仙道, 形解销化, 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 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 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 不可胜数也。”[7] 1368

这里不但出现了西周传统宗教所不见的海外仙人, 还大量出现了造神仙的“燕齐方士”, 他们掀起的造神活动延及秦汉。从《史记·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后汉书·方术列传》可知, 方士多是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 对民间的鬼神迷信、方术巫技比较熟悉。春秋以前的神职人员, 如祝、宗、卜、史都是来源于王官, 朝廷可以垄断宗教活动。而战国大量出现的方士却是以民间的宗教活动为背景的, 他们以阴阳五行的学说和民间宗教技能来干谒帝王, 奔竞于公门。中国民间宗

教多与生活、生产巫术联系;与宗法等级化的西周宗教大为不同。随着方士的大量出现,这种新的宗教精神因此渗透于朝野两方。

从宗教源流看,对自然现象的迷惑不解最早引起了各种超自然崇拜活动。早期的采集、狩猎、畜牧、农耕等生产方式都是极为依赖自然环境的。人们为了乞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无不很早就对神秘的自然顶礼膜拜。国家形成后,社会矛盾的异化形式天神、地祇、人鬼成了幽灵世界的统治者。人们按照人的社会等级来安排神的地位。如西周宗教中,至高无上的是昊天上帝,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其余还有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诸神;地祇中有代表国土的社稷崇拜,此外还有山林川泽等地域神灵,而以社稷为尊。人鬼中则以王室的宗庙祭祀最完善,占据信仰的中心地位。普通庶民不能祭祀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神灵。

但政治化的神灵会随政权的倒塌而丧失权威,自然崇拜性质的神灵却随农耕生产的必要性延续下去。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宗法化的政治神灵体系礼崩乐坏之际,自然神灵反倒获得发展。与政治神灵的祭祀等级化不同,自然神灵崇拜包含有大量数术方技的巫术内容,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祀百神的蜡祭、祀地神的社祭、求雨的雩礼、驱鬼的傩仪,都有广泛的民众参加,神性都是现实生活的曲折投影。自然神灵不似等级化的西周宗法化的神灵,不是那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成公 3年),而是如同古人面对的自然界,往往是善恶参半的;人们既要祈之以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又畏之以灾殃疫疠。所以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往往应之以软硬两手。以祈祷献祭等仪式来取悦、讨好神灵,是其软的一手;以巫术方法对付神灵,"征服自然"是其硬的一手。

先秦时期人们对待自然神灵的礼仪就充满着矛盾的态度。从先秦史料上来看,人们"祈福"的仪式往往在可以预料的、正常时间里进行;如祈年、祀高禖、祀农桑等。而"弥灾"的仪式往往是突发的、非常规的。如雩、祓禳、禜等等仪式,正因为不测之处太多,为平息恐惧、不安心情,此仪式都充满巫术手段。巫术是对自然灾害、魑魅魍魉硬的一手。

《左传》就记载了很多巫术活动,昭公元年记道:"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5]1219

《说文》曰:"禜,设绵蕝为营以禳风雨雪霜、水旱疠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禜卫,使灾不生。礼记曰雩禜,祭水旱。"[8]8这是一种强制巫术。山川日月之神德性不定,往往作恶,祈祷无用,必须应之以巫术以强制之。春秋时代昊天不彰,无德以配天,而鬼神无常,不可信任,故人们陷入工具性的巫术迷信,用巫术来消灾弥祸。《左传》昭公 19年记:"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禜焉。"[5]1405

巫术是在恐惧、无知状态下经验性扭曲的迷信方式,广泛地存在于生产力弱小的自然经济社会,作为生产能力不足的一种补充。在极端依赖自然环境、而且难以预测结果的生产、生活领域巫术往往有深厚的土壤。

根据英国宗教学家弗雷泽(J G. Fraæ r)的研究,早期人类社会存在广泛的巫术崇拜现象。但在西方,经过古希腊哲学普遍主义影响的基督教塑造了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神上帝,上帝包揽了全部其他神的功能,力量无所不在。人们似乎只要诚心祈祷就可以获福,巫术因此无所用处反成了扰乱秩序的邪恶力量。中世纪欧洲教会激烈排斥巫术,形成屠杀、迫害女巫的狂热活动,据有关资料,仅仅在 15—17世纪就屠杀了近 50万名女巫[9]545。巫婆、神汉在西方文化环境下成为负面人物,这是和基督教对上帝的塑造分不开的。

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除了自然经济下农耕生产的对环境的极大依赖性、需要生产巫术弥补,还因为在信仰领域内至上的全知、全能、全善的普世性神灵始终未能建立。各种德性不定的神灵

轮番出场, 魑魅魍魉纷攘不绝, 妖怪厉鬼残生害命, 神界极不可信, 因此民间对神灵不是一昧虔诚信奉而是应之以软、硬两手。所以各种驱鬼、降妖、求雨、止灾、祛病、禳祸的巫术仪式一直是民间信仰中的护身法宝, 形成中国古老的民俗之一。阴阳五行家来源于民间, 从巫术上发展出他们的神学, 是顺理成章的。

三、神学化阴阳五行的思维特征分析

英国宗教学家弗雷泽认为巫术依赖的思维方式有两种: 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 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 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前者可称为“相似律”, 后者可称做“接触律”或“触染律”。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顺势巫术”, 或“模拟巫术”; 基于接触律的法术叫“接触巫术。”[10]19

我国巫术在阴阳五行化之前也处于这种原始思维阶段。如认为天也有同情心, 所以人间的不幸会“同类相感”; 大旱时焚烧巫尪似乎也可以感动上苍降雨。再如人留下来的头发、指甲甚至脚印, 都带有原型的生命力, 通过接触就可以“触染”。姜嫄“履帝武敏歆”(《诗经·生民》)感生怀孕, 正是这种接触巫术的表现。有了阴阳五行化后, 似乎又多了一种物化的控制力: “不必通过人情的感应, 只要合乎事物中的阴阳盈缩消长和五行生克就可以作用于自然。如阴阳家的求雨、止雨方法是: 求雨, 闭诸阳, 纵诸阴。其止雨, 反是。”[11] 193

巫术的思维本质是扭曲了的类比联想, 这种思维在战国末年已经广泛流行于朝野和各种典籍之中。它极度夸大了一些经验现象, 如《吕氏春秋·召类》说: “类同相召, 气同则合, 声比则应。故鼓宫而宫应, 鼓角而角动, 以龙致雨, 以形逐影。”[6] 706。

这里本来正确地观察到了“同频共振”的物理现象, 但是类推为“以龙形致雨”, 则是一种夸诞了。以同类相感为基础的巫术思维在被阴阳五行化之后, 更是括及一切事物: 这种类似不仅是感性形象上的相似, 而且还是在是在阴阳本质、五行功能上的类似。《吕氏春秋·精通》载: 月也者, 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 群阴盈; 月晦则蚌蛤虚, 群阴亏。夫月形乎天, 而群阴化于渊; 圣人形德乎己, 而四方咸饬乎仁[6] 655。

古人发现一些水生动物受月亮循环影响, 是一种正确的经验观察。但引申圣人的举止有一种德行波及四方的效用, 就有神秘的意味了。

农业生产与季节、气象变化有极大关系。所以观察自然界的物候变化, 以准确掌握时令指导农事是古代政令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从《尚书·尧典》到《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都有对农时节气的记载。而阴阳家正是出于观象授时的农政之官。《汉书·艺文志》说: “阴阳家者流, 盖出于曦和之官, 敬顺昊天, 历象日月, 敬授民时, 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 则牵于禁忌, 泥于小数, 舍人事而任鬼神。”[11] 102。

阴阳家的思想在有关农政、节令上有很多体现。战国时阴阳家将四时流转与人类社会的农政教令融为一体, 这在农耕社会有其合理性。农业生产要求不违农时, 强调顺应天时地利, 政治上则是国家的政令要与农耕季节相合, 若违反则必遭自然报复。

但是这些正确的经验一旦超出必要的范围、推及一切人事活动就有可能转向宗教和巫术的迷信领域。《管子·四时》说: “阳为德, 阴为刑, 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 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 彗星见, 则失和之国恶之; 风与日争明, 则失正之国恶之。是故, 圣人日食则修德, 月蚀则修刑, 彗星见则修和, 风与日争明则修正。此四者, 圣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诛也。”[6] 148。

华夏民族是重视实际轻玄想的民族, 那种纯粹虚构的天堂地狱、神灵鬼怪往往遭明智之士唾

弃,而渗透在经验事物中夸大、变形的巫术思维却容易大行其道。

邹衍的时代正是统治者需要宗教并创立宗教的时期。战国末年,天下大势已定,朝向政治统一之路发展。建立新的神权以维护政治合法性成了当时重要宗教任务。邹衍似乎对阴阳家传统领域的农政教令关注不大,而倾向制造证明"天命转移"、"君权神授"的新的政治神学。载有邹衍思想的《吕氏春秋·应同》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盛,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6]666。

五德终始说采取五行为框架的宇宙图式,将土木金火水的五行相胜系列与前后相继的五个帝王相配,构成一个德性相推、帝王相继的同构循环关系。这样,不同王朝代替所遵循的是披着自然现象外衣的天道规律,帝王之受命是天道赋予的。

五德终始说的主旨是天人感应,感应的中介是所谓"祥瑞",这本来是些异常自然现象,但阴阳五行学说使这一现象膨胀为宇宙规律的显示。巫术思维都有从感性出发却漫无边际地进行"因果联系"、不切实际地夸大的特点。司马迁准确地抓住了邹衍的这一思维特征。司马迁对邹衍的评价是:"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7]2345。

感性的扩张夸大采取"同类相应"的层层放大方式。人与天,圣人之心与神性就统一起来了。经过阴阳家的改造,阴阳和五行学说由朴素的自然哲学转化成为巫术思维与政治宗教的混合体。

阴阳家同时提出了五帝更替的神话,历代王朝的兴亡是五德转移法则在历史领域的表现,人力无法改变。人能做的就是通过五德胜衰所表现出的各种朕兆,来观察五德气运的变化,以及时把握时机,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盛德,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因为是从宗教上论证统一天下的真命天子将出现的理论。十分符合当时各国君主的胃口。邹衍因此大显于诸侯:"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坐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7]2345。

阴阳五行思想所包含的五德终始政治神学和自然崇拜在战国末年出现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中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开篇都按一年四季十二月,列出每月星象、物候、农事、五行之气以及应在当月祭祀的天帝和辅神。然后据此推演出天子应行的宗教仪式和应发布的政策号令。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的庞大体系中,天与人、自然观与社会观通过阴阳五行的媒介混合在一起。如阴表示肃杀、收敛,所以在秋季阴气渐盛之际行刑法、审案件、动干戈。阳表示生长、开放,所以在春季阳气渐长之时举办慈善、养生等事业。人事都是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自然节律来安排的。若违背这个自然节律行政事,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如:"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稿,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6]628。

阴阳之气可以以政令为媒介,层层放大,引起整个天下阴阳失调,造成天灾人祸。五行包括五方、五时、五色,起一种自然与社会"同频共振"的结合效应。春季天子要率百官迎春于东郊,参照木德行政令;夏季迎夏于南郊,参照火德行政令;秋季迎秋于西郊,参照金德行政令;冬季迎冬于北郊,参照水德行政令。但五行与四季无法完全相配,所以在季夏之后立土德,以黄帝和后土统帅,无政令颁布,不参与四季循环。

《十二纪》《月令》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历法、物候、气象、农事知识,并试图用阴阳五行的理论

通观归纳, 进行解释。这种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有序整体的观点无疑包括着古人极大的智慧, 而其将人事与自然结合的方式又携带着极大的巫术迷信思维。司马谈对阴阳家的评论, 揭示了这种精华与糟粕并行的思想特点: “尝窃观阴阳之术, 大祥而众忌讳, 使人拘而多畏, 然其序四时之大顺, 不可失也。”[7]3289。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在秦以后继续发展, 于两汉蔚为大观。嗣后, 历代史书无不立《五行志》对本朝灾祸休咎进行记录、预测。以阴阳五行形成的天人感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秦时期燕齐方士、神仙家开始大量造神, 至两汉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 阴阳五行的巫术性质不能解决安身立命等终极价值关怀问题, 这仍是儒家、道家的领域。汉代神学化的今文经学到东汉就衰落了, 而讖纬等迷信都行之不远。这方面都可以看到诸子争鸣时代形成的人文理性传统对宗教信仰的抑制力量。它阻止了中国发展成为神权国家, 但也不能从根源上铲除巫术、宗教产生的土壤。

参考文献:

[1] 庞　朴• 阴阳五行探源[J]中国社会科学, 1984, (3).
[2]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 许嘉璐. 文白对照十三经• 周易[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4] 列维• 布留尔. 原始思维[M]. 丁　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 杨伯峻撰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6] 二十二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8] 许　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9] 罗伯逊. 社会学[M]. 黄育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10] 弗雷泽. 金枝 [M] 徐育新, 汪培基, 张泽石, 译.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11] 郑天挺, 主编. 汉书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From the Natural Philosophy to the Political Theology
——The Yin Yang and Wu Xing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Qin

ZHANG Xiao-hu
(Law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008, China)

Abstract: The yin yang and wuxing element of those were China's oldest natural concepts of worship,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with the areas of philosophy and meaning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yin yang and wuxing elements changed from the natural philosophy t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five moral doctrine. Political theory of yin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combined with nature worship popular folk, was bared on Theology of the yin and yang elements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fter the Qin and Han had, far-reaching effects.

Key Words: nature worship;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thinking witchcraft